

# 論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轉變

張堂錡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提 要

民國北伐時期的女兵謝冰瑩，以其《從軍日記》、《女兵自傳》等作品在文壇獲得「永遠的女兵」稱號。雖然謝冰瑩曾經否認自己與左聯的關係，但許多資料顯示她於1930年代曾積極參與左翼社會革命解放運動，甚至是北方左聯的發起人兼重要成員。然而，來台之後，她開始隱藏和修正過往曾經有過的激進左翼社會主義思想，最有力的證據是她將有左傾嫌疑的小說《前路》銷毀，並對《女兵自傳》進行大幅修改，凡是被政府視為禁忌、具左翼色彩的口號字眼都被她小心謹慎地刪除修改。從左翼到右翼，從激進到溫和，她的立場轉變到底是主動選擇，還是被迫自保？她與左聯之間到底有多深的關聯？透過《女兵自傳》不同版本的對照，是否可以鉤沈出謝冰瑩內心難言的隱痛？這是本文試圖處理的問題意識與討論重心。

**關鍵詞：**謝冰瑩 左翼思想 左聯 從軍日記 女兵自傳

# 論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轉變

張堂錡

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寂寞的民國女兵

和來台的「五四」一代作家如胡適、林語堂、蘇雪林、梁實秋等人相比，早在 1927 年就在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從軍日記》而聲名大噪的謝冰瑩，顯然寂寞許多。

中研院有胡適紀念館，陽明山有林語堂紀念圖書館，台灣師大保留梁實秋故居，成功大學保留蘇雪林故居，這些文化遺跡的保存，都是對這些「五四」文人的一種致敬與緬懷。此外，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更是學術界特有的一種紀念方式，藉以表達對研討對象在學術成就、文學表現、文化人格等方面的推崇表彰。於是，為紀念林語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後改制為佛光大學）舉辦「林語堂的生活與藝術研討會」（2000 年）、東吳大學舉辦「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與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為紀念梁實秋，《中華日報》在其過世後長期舉辦「梁實秋文學獎」（1988 年—）、台灣師大相繼舉辦「梁實秋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2002 年）、「紀念梁實秋先生學術研討會」（2011 年）；為紀念蘇雪林，成功大學成立「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1995 年）、「蘇雪林研究室」（2008 年），陸續舉辦「海峽兩岸蘇雪林教授學術研討會」（1999 年）、「紀念蘇雪林教授暨中文系創立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06 年）、「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2011 年）、「蘇雪林及其同代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至於「大名垂宇宙」的胡適就不用多說了。

以上豐碩的成果借余光中的一句話「金燦燦的秋收」<sup>①</sup>來形容應不為過。然而，在這些作家被人們用各種方式「記得」的同時，謝冰瑩似乎正被人們「遺忘」——她在台灣故居沒有被保留，關於她的學術研討會也很少舉辦<sup>②</sup>。李瑞騰教授在2014年6月參加梁實秋故居文物展開幕活動後，曾有感而發地提到：「大學校園設名人故居，像在台灣成功大學的蘇雪林故居，由成大博物館負責管理，中文系且設有蘇雪林研究室，為蘇先生編選集、出版日記等，還舉辦研討會，做得算相當不錯了。有時我不免在想，如果台灣大學設台靜農故居、政治大學設王夢鷗故居、中興大學設孟瑤故居、輔仁大學設張秀亞紀念館、文化大學設胡品清文學館等等，除了和民間社會成立的作家紀念館（如賴和、楊逵、鍾理和、吳濁流、李榮春等）相互輝映，更可彰顯大學和文學的緊密關聯。」<sup>③</sup>他提到了許多作家，就是沒有提到和梁實秋同在台灣師大任教、退休的謝冰瑩。如此對待這位以文學揚名國際的「民國第一女兵」，且在台灣生活26年（1948-1974）、在台灣師大國文系任教23年的「五四」作家<sup>④</sup>，顯然並非合情合理，且不免有些令人遺憾。

也許是到了該給謝冰瑩一個更合理定位的時候了。作為國民革命的第一批女兵，她曾在北伐戰爭中親赴前線，隨軍出征，從事救護與文宣工作；1930年代初，她兩度留學日本，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及溥儀賣國而遭日本憲兵逮捕，在監

---

① 余光中在為梁實秋編紀念文集《秋之頌》時寫了一篇序言〈金燦燦的秋收〉，對梁實秋在文壇及學界的貢獻作了詳細的分析與深情的讚頌。文章見《秋之頌》（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25-39。

② 謝冰瑩位於湖南省冷水江市鐸山鎮龍潭村的故居，已於2011年被湖南人民政府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但謝冰瑩在台師大任教期間的故居卻沒有太多人注意。據謝冰瑩學生、台師大國文系退休教授黃麗貞告知，謝冰瑩任教台師大期間住在和平東路二段的教師宿舍，但這些日式平房後來拆除改建，一部份改建為科技大樓，一部份為新的教師宿舍，謝冰瑩分配到和平東路二段118巷4弄28號1樓，但她當時已移居美國，偶爾回台時才短暫小住，現在也已轉讓他人。至於研討會方面，文建會曾經於1988年3月9日舉辦過一場「文藝作品討論會」，討論王藍的《藍與黑》及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會議時間為9點至12點，討論時間很短，而且謝冰瑩在美國因為要照顧丈夫並沒有回台出席。

③ 李瑞騰：〈把梁實秋故居經營成為大學的文學基地〉，《人間福報》副刊，2014年6月11日。

④ 謝冰瑩於1957年至1960年曾有三年時間應邀到馬來西亞僑校華聯中學任教，擔任中文組主任。

獄受盡酷刑，卻寧死不屈；抗戰爆發，她立即趕赴長沙，發動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上前線為傷兵服務，並四處演講、組辦救護人員訓練班。從北伐到抗戰，謝冰瑩所表現出的戰鬥勇氣與民族氣節堪為現代女性的表率。作為民國文學的女性作家，她在日記、傳記、報導文學等紀實文學的表現同樣亮眼，《從軍日記》和《一個女兵的自傳》已是足以傳世之作，不僅在當時是暢銷書，後來還被譯成英、日、法、西、葡、意、韓等多種文字，並拍成電影，可以說造成了一定的國際影響。來台後，她依然在文壇持續耕耘，陸續出版了散文集《冰瑩憶往》、《冰瑩遊記》、《愛晚亭》、《作家印象記》，小說集《紅豆》、《霧》、《碧瑤之戀》，兒童文學《小冬流浪記》、《小讀者與我》、《舊金山的四寶》及遊記、傳記等多種。合計在她七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寫了一千多萬字，出版了八十多種著作，這些豐碩的成果已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璀璨瑰寶。

## 二、謝冰瑩的左翼思想及其實踐

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傻瓜。」

⑤根據資料來看，三十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

謝冰瑩是以革命文學的實踐者姿態投身於左翼文壇。她的《從軍日記》之所以受到歡迎，除了文字的樸實自然、情感的真摯激動、題材的新穎突出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在文中處處流露的革命激情、愛國意識，以及透過革命對未來美好光明世界的嚮往。早期左翼作家的革命書寫，多強調唯有通過革命才能摧毀舊世界、創造現代文明的全新生活，作品中所激發出的革命情緒，使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使民眾醉心於革命的想像中。20歲的謝冰瑩之所以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行列，不能說沒有受到這股革命浪潮的激發與鼓舞。

---

⑤ 這是1996年謝冰瑩對其兒女親家杜重石所說的話。杜重石是謝冰瑩之子賈文輝的岳父，他受女婿之邀，於1996年5月12日由洛杉磯去舊金山旅遊，並拜訪親家謝冰瑩。見〈記謝冰瑩〉，收錄在艾以、曹度主編：《謝冰瑩文集（上）》（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6。

以《從軍日記》中的〈給KL〉為例，她不斷強調革命的合法性：「母親，時代已經不是你青年的時代了！新的怒潮，已淹沒了舊的一切。你只能干涉你的兒女，卻不能管理別人，更不能阻止時代的進化，革命的怒濤！……爲了母親，爲了我，爲了與我同命運的人，爲了比我更苦的被壓迫民眾，我不能不獻身革命！」她反覆向她的母親解釋革命的重要性與真正意涵：「母親，你不要聽了革命兩字就害怕，要知道革命並不是兒子革父母的命，弟弟革哥哥的命，而是根本推翻整個的舊社會，掃盡一切惡勢力！」她因此自稱爲「舊社會的破壞新社會的創造者」，她的理想就是「弄個炸彈將整個舊社會炸毀」。支撐她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的理由，正在於她堅信，只有破壞舊社會，才能建設新社會的美好想像：「母親呵，記著，未來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萬惡的封建社會，眼前就會消滅了。呵，舊的，黑暗的，消滅！新的，光明的，產生！黑夜過了，明天就是烈火似的太陽，出現東方，普照宇宙！」<sup>⑥</sup>爲了美好的未來，現在的犧牲都有其神聖的意義，「革命」成了她生命人格的理想，現實人生的出路，也是她文學創作的理念與追求。

對《女兵自傳》這部代表作，來台後的謝冰瑩表現出積極的重視態度，重印或修訂再版都費了一番心思，相較之下，她對成名作《從軍日記》似乎顯得冷淡許多，不見重印或新版。推測其因，應該與書中鮮明激烈的左翼思想有關。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例如：

他知道自己貧窮，不是「天賦之命」，而是軍閥，土豪劣紳，地主買辦資本家的剝削使然，他連祖宗的神位都丟了。……他說：「我這裡是個祠堂，但現在我們要消滅家族觀念，所以改為（農協）十區三分部的會址

---

⑥ 謝冰瑩：〈給KL〉，《從軍日記》（上海：光明書局，1933年），頁94、95、96、100。《女兵日記》有上海春潮書局（1929年）、開明書店（1930年）、光明書局（1931年）三種版本，正文相同，但附錄文章有所不同，本文所採用的1933年版，是1931年版的再刷。

了。」（〈從軍日記〉）

湖南民眾尤其是農民之激烈，……近來他們更有組織更有力量了。他們對於土豪劣紳及地主等很不客氣的只管「活打死」，「槍斃」，「刀殺」，每天常常聽到殺人的叫喊聲，槍砲聲，在我們很小的村落裡就結果了八、九條土豪的狗命，好痛快呀！（〈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農民太野蠻，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現在是他們出頭的時候了，對於壓迫他們的敵人正如我們對付軍閥和帝國主義一樣只管拼命地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我們真正想革命成功，只有希望每個農民都暴動起來打倒軍閥的基礎土豪劣紳地主等，每個工人都暴動起來打倒壓迫他的店主，資本家，買辦階級等。親愛的工農朋友呵，盡你們的力量去打倒一切壓迫你們的敵人，你們只管猛力的打，猛力的殺，你們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在刀槍裡面奪取的。（〈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sup>⑦</sup>

尤其是〈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可以看到她左翼社會主義的積極思想。文中寫道，在北伐途中，見到湖南長沙農民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她感到振奮，認為革命可以破除封建統治力量的不合理，但她同時提到一個實例，即農民在完全不知為何舉手的情形下，竟隨便舉手，於是一個土豪就被槍斃，事實上農民對開會的目的完全缺乏應有的認識與判斷。這個故事，雖然讓她思考農民運動需要有明確的方向引導，以及組織訓練，但即使如此，她對農民草率誤殺土豪劣紳一事，仍給予正面肯定，由此看來，她作為左傾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姿態已經十分明顯。

謝冰瑩不僅有鮮明的左翼思想，而且具體落實在現實生活中。透過四次逃婚，她表現出衝決封建禮教網羅的決心；透過投身軍伍，表現出對國民革命的堅定信仰；透過參與婦女運動，表現出對婦女解放的關心；透過對湖南農民運動的熱情

---

⑦ 以上三則引文見謝冰瑩：《從軍日記》，頁4、7、9。



介紹，表現出推翻地主、壓迫階級的鬥爭精神。凡此，都可以看出，在 1930 年代謝冰瑩的政治意識與革命立場。

此外，有許多資料顯示，在 1930 年間，她曾經熱情洋溢地參與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創建與領導工作，因而也被視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作家之一<sup>⑧</sup>。假如確有此事，就更足以印證謝冰瑩曾經有過的左翼思想與立場。然而，有關謝冰瑩與「左聯」的關係似乎成了一樁公案。

1979 年 8 月《新文學史料》中收有楊纖如〈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雜憶〉及孫席珍〈關於北方左聯的事情〉二文，都指出謝冰瑩是北方左聯的發起人之一。楊纖如是謝冰瑩軍校時期同學，參加過 1930 年上海左聯成立大會，謝冰瑩邀請她加入北平的左聯，她寫道：「北方左聯開過多少次籌備會，我記不清了。我只參加過兩三次，一次是在輔仁大學張鼎和宿舍裡，一次是在涇水河謝冰瑩家裡……我是在籌備接近成熟的階段，謝冰瑩才邀我參加的，她說：『你剛從上海來，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的情況介紹一下吧。』」<sup>⑨</sup>謝冰瑩當時正在北平女師大讀書，和潘漠華、孫席珍、段雪笙、楊剛、李俊民等人積極籌備北方左聯，終於在 1930 年 9 月成立。楊文還指出，北方左聯成立後組成包括潘漠華、謝冰瑩、段雪笙等九人的核心小組（稱為「執委」）。由此可知，謝冰瑩不僅是籌備者，還是主要領導者；孫席珍是北平女師大老師，謝冰瑩是聽過她課的學生，她提到，謝冰瑩「也是發起人之一」，由於謝冰瑩的丈夫符浩（筆名符號）被捕入獄，「她把他倆的孩子名叫小號兵的寄養在我家，所以經常跑來，一來就很起勁地同我和楊剛討論左聯的工作。」<sup>⑩</sup>這裡提到謝冰瑩的丈夫被捕一事，在符號自述的文章〈謝冰瑩和

⑧ 包括鄧政的〈湖湘文化精神孕育的左翼文學話語——湖南左翼作家群論〉（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李夫澤的〈謝冰瑩與「左聯」〉（《婁底師專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44-47）、常彬的〈「忘記自己是女性」——從謝冰瑩、馮鏗創作看 1930 年代左翼女性的從軍想像〉（《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 年第 2 期，頁 61-66）等文，以及姚辛：《左聯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頁 31），都將謝冰瑩納入左聯作家群體來討論。

⑨ 楊纖如：〈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雜憶〉，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年），頁 409、410。

⑩ 孫席珍：〈關於北方左聯的事情〉，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頁 391。

我的一段婚姻》中有清楚的交代：

1930年，我們在北平。冰瑩要生孩子了，家裡卻窮得要命。……孩子出生了，是一個精靈可愛的小女兒。留在醫院沒有住院費，回到家裡沒有奶吃，千難萬難，拖到8月，我實在沈不住氣了，想到天津北方書店找點公開的餬口的工作。北方書店是中共在天津建立的一個地下工作機關，它已經被破壞了，巡捕房留有便衣偵探臥底，我一到那兒就被捕了，輾轉被投入天津第三監獄。……天津發往上海《申報》的專電也說「破獲共黨機關，捕符沙等三十六人」（當時我用的是弟弟符沙的證件）。<sup>⑪</sup>

文中明確提到符號身為共產黨員的身份，這對當時謝冰瑩的左傾思想與政治立場必然產生相當的影響。

除了楊纖如、孫席珍外，當年參加過北方左聯活動的一些當事人，也都會撰文回憶過謝冰瑩與北方左聯的密切關係。例如楊秀怡的〈回憶「左聯」和魯迅先生〉寫道：「是年夏天，曾在上海參加過『中國左聯』成立大會的楊纖如、段雪笙、潘漠華等先後來平，在黨的指示下，著手籌備成立『北方左聯』，由謝冰瑩、段雪笙、潘漠華等組織核心小組，開過多次籌備會議。我是冰瑩的莫逆之交，在她家出入自由，當然也時常參加會議，出點主意。」<sup>⑫</sup>又如楊纖如的回憶：「1930年5、6月間，段雪笙、潘訓（漠華）從上海參加過上海『中國左聯』成立大會，來到北平市委宣傳部工作。他們按照『中國左聯』的精神，團結女作家謝冰瑩及幾個大學的積極分子，先後開了幾次籌備會（此時我已來到平，也參加了），擬定綱領及章程、擇定9月18日下午在北平大學法學院一院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口頭推選出九名執委。……這九名執委是：段雪笙、潘訓、謝冰瑩、鄭吟濤

---

⑪ 符號：〈謝冰瑩和我的一段婚姻〉，收入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引自該書頁17-18。

⑫ 楊秀怡：〈回憶「左聯」和魯迅先生〉，左聯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左聯」紀念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頁33。



……前三人是常委。」<sup>13</sup>由此可以證明，謝冰瑩和左聯關係確實極為密切。

至於謝冰瑩是不是共產黨員，目前找不到這方面的資料，但從許多北方左聯盟員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到謝冰瑩與地下共產黨關係匪淺。例如楊秀怡在〈回憶「左聯」和魯迅先生〉一文中就提到：「我們常在謝冰瑩家裡和雪笙、潘訓見面」<sup>14</sup>，段、潘二人都是共產黨員，謝冰瑩和他們如此密切交往，很難不啓人疑竇。有些回憶甚至直指謝冰瑩就是地下黨員，例如楊纖如說：「1931年初，謝冰瑩參加了非常委員會領導下的北平新市委籌備處，被以籌備處分子開除出黨。」<sup>15</sup>如果不是黨員，何來開除之舉？還有楊秀怡的文章更提到謝冰瑩曾於1930年暑假後，交派黨的任務給還在北平大學法學院就讀的她，要她去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籌備會議，謝冰瑩對她說：「派你去，是黨的信任，你不是一向準備爲黨出力嗎？現在派你以『北平普羅文化運動大同盟』代表身份開會，你代表北方去參加全國蘇維埃籌備代表會，全國革命互濟會；還要去和『中國左聯』進行聯繫。你放心，我們一切已經給你準備妥當了。」<sup>16</sup>如果這個說法無誤，謝冰瑩的口吻顯然不可能是「黨外人士」。但因為謝冰瑩極力否認此事，故有關她與地下黨關係的真相尚需更多的材料佐證，才能論斷。

不僅如此，發生於1933年的「福建事變」，謝冰瑩也可能牽涉其中。與謝冰瑩相交長達七十餘年的作家魏中天，不僅和謝冰瑩是黃埔軍校、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同學，並且一起參與了「福建事變」，後來先後赴日，又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再次同窗學習。謝冰瑩於1970年代旅居美國舊金山，魏中天赴美探親，兩人在分隔近三十年後竟在異地重逢，從此書信往返不斷，友誼歷久彌堅。魏中天

<sup>13</sup> 楊纖如：〈壽南北兩「左聯」六秩〉，左聯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左聯」紀念集》，頁27。

<sup>14</sup> 楊秀怡：〈回憶「左聯」和魯迅先生〉，左聯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左聯」紀念集》，頁38。

<sup>15</sup> 楊纖如：〈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雜憶〉，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頁413。

<sup>16</sup> 楊秀怡：〈回憶「左聯」和魯迅先生〉，左聯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左聯」紀念集》，頁33。

曾提到有關「福建事變」的一段回憶，指出 1933 年 11 月，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十九路軍為主體，在福建龍岩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與中央蘇區聯合起來反蔣抗日。謝冰瑩和魏中天都加入此一革命政府，而謝還擔任宣傳科長<sup>17</sup>。魏中天早在 1929 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謝冰瑩是否為中共地下黨看來並非空穴來風。李夫澤在〈謝冰瑩與「左聯」〉一文中也明確指出：「1933 年 11 月，福建事變爆發，她和福建人民政府中的徐名鴻等關係密切，被任命為福建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三個月後，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她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再次潛入上海，在《申報》上看到包括自己在內的通緝名單，於是又回到長沙。」<sup>18</sup>雖然魏、李二人提到的職位不同，但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任職卻是說法一致。

謝冰瑩不否認於 1933 年確有閩西之行，在她的《女兵自傳》（上海晨光版，1948 年）中有〈多難的「三八」〉、〈沒有目的底旅行〉、〈跛子校長〉等文章提及此事。她於遊歷完閩西之後，前往廈門中學教書，遭人「造謠」說她是「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她寫了一篇〈意外之災〉試圖澄清，但受此牽累，她只得離開廈門。

這一段不算長的特殊經歷，包括發起、組織北方左聯、與中共地下黨的往來，顯然在謝冰瑩的生命歷史中是有著複雜的動機與時代因素的影響。而這段左傾經歷在她來台之後，不是絕口不提，就是斷然否認，因而使得謝冰瑩與左聯的關係變得諱莫如深。不過，從以上資料考證，謝冰瑩從《從軍日記》起，直到 1930 年代初期，她的左翼作家身份和立場是無庸置疑的。她的否認與澄清，固然使得這方面的討論難以獲得最終的釐清，但也提供了我們對謝冰瑩思想歷程與寫作歷程重新認識的機會和角度。

---

<sup>17</sup> 見欽鴻：〈關於謝冰瑩〉（二篇），《新文學史料》第 4 期（2002 年），頁 132。

<sup>18</sup> 李夫澤：〈謝冰瑩與「左聯」〉，《婁底師專學報》第 3 期（1999 年），頁 45。

### 三、謝冰瑩左翼立場轉變的觀察

謝冰瑩與北方左聯的關係在 1931 年 3 月隨著她的離平南下而逐漸疏遠，儘管她並沒有因此就與左翼文壇斷絕往來，她後來還在左聯刊物《榴火文藝》上發表〈獻給榴火〉，在《京報》副刊《熔爐》第 6 期發表〈《毀滅》連續圖畫序〉等作品<sup>19</sup>，然而，這些作品後來都沒有收入她的作品集或選集。

謝冰瑩和左聯關係的疏遠，根據研究者李夫澤的推測，認為與生活家計的壓迫，以及與丈夫符業奇（筆名符號）感情不睦，決定結束這段婚姻而離開北平有關，但這兩個動機造成她在思想上轉變的可能性不高，政治上的原因或許才較有說服力。同為北方左聯成員楊纖如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一個重要的細節：

1931 年初，謝冰瑩參加了非常委員會領導下的北平新市委籌備處，被以籌備處分子開除出黨。此後謝即南下，在生活道路上隨遇而安。

張郁棠，燕大學生。他在左聯執委出現不多，不久即與謝冰瑩同時以參加籌備處活動而被開除出黨，隨之也就離開了左聯。從那以後再沒聽到他的消息。我只記得黨內通知我們，說謝冰瑩、張郁棠都是籌備處分子，對他們採取隔離措施。<sup>20</sup>

究竟此事的真相為何，因為沒有資料可查，所以不得而知。謝冰瑩究竟有無加入（地下）共產黨，從這段文字看來是有的，否則如何「開除出黨」？但除了這篇回憶文章提及，其他佐證闕如，難以遽下論斷。但不論如何，「這件事給謝冰瑩的打擊是巨大的，使他政治上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和左翼作家隊伍疏遠了。」<sup>21</sup>

<sup>19</sup> 參見姚辛：《左聯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頁 40、52。

<sup>20</sup> 楊纖如：〈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雜憶〉，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頁 413-415。

<sup>21</sup> 同註 17。

謝冰瑩離開北方左聯（或者包括「開除出黨」）之後，她的政黨立場與文學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1931年8月，她離開北平到上海5個月後，寫了一篇〈《從軍日記》的自我批判〉，收入再版的《從軍日記》，文中可以看出她不同以往的文學觀點，特別是對左翼陣營提倡的革命文學，她批評道：「我不滿意中國的所謂革命文學，我覺得那些標語口號似的文章絕沒有辛克萊作品給與讀者的影響大。」她認為當時的革命文學雖然有「某種意識」，但「缺乏實際生活的經驗」，「因此寫出來的作品是那樣不深入，與勞苦群眾不關痛癢，他們她們無論怎樣努力製造革命文學，但結果仍不免隔靴搔癢，終歸失敗。」<sup>22</sup>對於1930年代左聯成立後的上海文壇，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上海時，曾爲了左翼的問題，鬧得天花亂墜。報紙雜誌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內戰文字，而沒有看到他們共同爲國家爲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頭來悄悄地嘆息，我始終沒有加入過他們的陣線，沒有被任何人利用寫過一個字的幫閒文章。」<sup>23</sup>由此可以看出她已經自覺地要與左翼文壇保持距離。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她與左翼文壇關係的微妙變化。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雜誌，提倡幽默小品的寫作，受到包括魯迅等左翼作家的批評，但謝冰瑩在1932年於《論語》發表了〈家信〉、〈夫子之「盜」〉二篇文章，雖然不多，但可以看出她對林語堂的支持；1934年和1935年，林語堂陸續創辦了《人間世》、《宇宙風》，作爲提倡幽默閒適之風的主要陣地，尤其《宇宙風》的問世，正值左翼文藝界展開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但《宇宙風》的編者卻把這場論爭說成是「紙上談兵」、「新道學」，表現出與左翼文藝界相對立的傾向。對於這兩份刊物和林語堂的立場受到左翼作家的圍剿，謝冰瑩不會一無所知，但在這兩份刊物上，我們看到謝冰瑩從1935年到1939年相繼發表了許多作品，包括其代表作《女兵自傳》中的〈被母親關起來了〉、〈逃亡〉、〈第二次逃亡〉、〈第三次逃奔〉、〈一個女兵的自傳〉，〈當

<sup>22</sup> 謝冰瑩：〈《從軍日記》的自我批判〉，《從軍日記》，頁138。

<sup>23</sup> 閻純德：〈謝冰瑩：永遠的「女兵」〉，原載《傳記文學》1994年第12期，收入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引自該書頁140。

兵去》，以及〈大學生活的一斷片〉等，發表的篇數不少，這樣的力挺，一方面固然是感念林語堂對她曾有的提攜之恩，但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態度和左翼漸行漸遠。

事實上，謝冰瑩的左翼立場在抗戰時期已經有了較為明顯的轉變。身為第一代女兵，她曾經在北伐時期找到自己的定位並獲得極高的聲譽，但隨著政治情勢的發展，她失去女兵的身份與光環，在生活困境中沈寂，在感情糾結中浮沈，直到1937年抗戰號角響起，她二度從軍，再次穿上女兵的軍服，這給了她新的生命追求與人生意義。她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帶領婦女到前線為傷兵服務。她直言：「真的，我不知用什麼文字來形容我的快樂，解除武裝整整地十年了！我無時不在回憶那一段有意義，有價值的痛快生活，也無時不在留戀那種又艱苦又悲壯，同時又很有趣的行軍生活；真想不到今天我又實現十年前的美夢了！」<sup>24</sup>和北伐時的內戰不同，抗戰面臨的是民族存亡，在國民政府領導對日作戰的號召下，謝冰瑩很自然地選擇並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她的女兵形象與光采也因此再度躍入群眾的視野。在國族意識下，黨派意識已經不再重要，曾有的左翼思想也被暫時拋諸腦後了。二度從軍期間，她還於1938年在重慶受聘國民政府教育部，擔任特約編輯工作，負責撰寫宣傳抗日的通俗作品，到1939年，她陸續完成了《苗可秀》、《毛知事從軍》等通俗抗戰小說，發表於重慶的《時事新報》<sup>25</sup>。

她的立場轉變從《抗戰日記》也可以看出。面對日敵強寇入侵，熱血的謝冰瑩不僅很快被激起強烈的民族意識，同時深刻體認到不分男女、階級、黨派都應該一致團結抗日，支持國家政府不分彼此、「同心同德」的主張。例如寫於1938年的〈動員民眾與抗戰到底〉，文中藉李品仙副司令長官在山東各界抗戰宣傳大會上的演講提出呼籲：「只要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應該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

<sup>24</sup> 謝冰瑩：〈忠孝不能兩全〉，《女兵自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頁309。

<sup>25</sup> 對於謝冰瑩接受教育部編輯工作，撰寫抗日宣傳的文學作品，在她的《女兵自傳》中的〈戰區巡禮〉一文中曾提到：「我就在這個時候，替教育部寫了五萬多字的通俗抗戰小說。」（頁320）；同時，在小說集《梅子姑娘》（西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41年）的序言中，她也提到：「民國二十八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時，專寫抗戰通俗小說。」（頁1）

分男女老幼，也不分農工商學兵，大家都切實地團結成一個鋼鐵的陣線！」並高喊「擁護蔣總裁領導抗戰到底！」<sup>26</sup>；又如〈往哪裡逃〉一文，她有感而發：「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著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瞭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沒有民族根本就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中國，到處都是日本的強盜們的飛機大砲轟炸的目標了，可憐的老百姓呵，你逃到哪裡去呢？」<sup>27</sup>面對「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局勢，以及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機，使她在個人／國家、階級／民族上有了新的領悟，也使她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有了新的認識與支持。這個轉變無疑間接促成了她於 1948 年赴台的決定。

不論是「開除出黨」使她對左翼陣營失望而轉向，還是抗戰烽火使她選擇與國民政府立場一致，對於謝冰瑩在 1940 年代由左轉右的政治抉擇，並沒有太多直接相關資料可以分析其心路歷程。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當她做出決定到台灣之際，也是她和左翼徹底告別的時刻。

#### 四、來台後對左翼立場的隱藏與修正

來台之後的謝冰瑩，開始隱藏和修正過往曾經有過的激進左翼社會主義思想，逐漸從激進轉為溫和，從革命左翼變成保守右翼。不管是主動選擇還是被迫自保，上述與北方左聯、甚至中共地下黨的關係成了她心中難言的隱痛。特別是在反共政策主導的戒嚴時期，稍一不慎，即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如果上述經歷屬實，則謝冰瑩的心理必然長期承受極大的壓力，因此，對過往歷史的否認、封口，對有左傾嫌疑的作品加以改寫、銷毀，也就成了她不得不為的自保措施。

##### （一）斷然否認曾加入左聯及政黨

1981 年 6 月 25 日，上海《文學報》在《人物誌》專欄裡發表了謝冰瑩的故友

---

<sup>26</sup> 謝冰瑩：〈動員民眾與抗戰到底〉，《第五戰區巡禮》，編入《抗戰日記》（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年）下集，頁 347。

<sup>27</sup> 謝冰瑩：〈往哪裡逃〉，《在火線上》，編入《抗戰日記》中集，頁 252。



梁兆斌的散文〈遙念謝冰瑩〉，文中提到謝冰瑩「三十年代參加北方左聯，為發起人之一，並曾一度被選為九人執委之一。」謝冰瑩在美國讀到此文後，立刻於7月24日在致老友魏中天的信中說：「我不是左聯發起人，因為教書、上課太忙，所以沒有工夫參加工作。」又說：「我從來沒參加人民政府活動，也沒有被通緝過，更沒受流亡之苦。」同年12月7日，她再次寫信給魏中天強調說：「我從來沒有參加人民政府工作（你參加，我完全不知），更沒有反蔣，我是始終擁護三民主義，擁護孫總理和蔣總統的；否則我為什麼要跑去台灣？」後來在給親友的信中仍多次斷然否認加入左聯和涉入閩變之事<sup>28</sup>。

1991年8月，她在接受專訪時提到在福建廈門中學教書的情形，特別說明了她當時對黨派、政治的看法：

就那個時候，有共產黨啊，一直嘛想要我加入他們的黨。我不加入。我說我教我的書。我對於什麼黨什麼派我都不高興。我都不喜歡。我只教我的書。我愛我的國家，愛我們的中華民族。我不愛什麼黨的，什麼黨派我都不願意搞，什麼黨開會，我說我最討厭的。……共產黨很希望我加入他們的黨，我不加入，我不加入。……不管他是共產黨國民黨，什麼黨，搞政治的人我都不大喜歡。說老實話，所以後來他們要我加入國民黨，我說，哎呀，不要加入了。

當問到丁玲的思想是否和她有些接近時，她並不反對，但批評丁玲「思想太左，太向共產主義那方面傾向」，而她還是屬於「民族主義」、「三民主義」<sup>29</sup>。

謝冰瑩的否認不能說完全沒道理，例如她主動選擇來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反

---

<sup>28</sup> 以上謝冰瑩的否認說法引自欽鴻：〈關於謝冰瑩〉（二篇），《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頁134。魏中天晚年時將謝冰瑩給他的書信編輯成《永恆的友誼——謝冰瑩致魏中天書信集》（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0年）。

<sup>29</sup> 以上專訪內容見孟華玲：〈謝冰瑩訪問記〉，原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3期，收入閻純德、李瑞騰編選：《女兵謝冰瑩》，引自該書頁204、211。

駁理由。然而，這些晚年的澄清和解釋，並不能證明她在北伐時期和 1930 年代的思想傾向即是如此。同樣的，即使她在 1936 年以後和共產黨、左聯等已經漸行漸遠，也不能推翻她之前與左聯密切往來的歷史事實。正因為她的政治立場逐漸由左轉右，放棄階級革命，投向民族主義，所以抗戰勝利之後，她才會選擇離開大陸，奔向台灣。

## （二）大幅修改《女兵自傳》等作品

除了私下和公開否認其原有的左翼立場，謝冰瑩來台之後，唯恐讓人對她有左翼的聯想，開始對自己在大陸時期作品進行修改增刪，甚至予以銷毀。她在寫於 1957 年的〈焚稿記〉一文中提到，曾經把《湖南的風》、《前路》、《梅子姑娘》等三本書，通通點火燒燬，而且「從燒得發亮的火光裡，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笑容，也看到了自己美麗的前程。」焚書的原因是，她認為《湖南的風》寫得很潦草，《梅子姑娘》中有幾篇很平凡、幼稚，而《前路》之所以要焚燬的主因是：「隨便翻開一唸，有些標語口號似的對話，一看就不順眼。那時還是北伐以後，不但我如此，許多寫文章的人，也是開口革命、改造，閉口國家、民族。還有一兩篇被別人看做思想有問題的文章……爲了這本書，也曾經給我帶來不少麻煩：左翼作家批評它是小資產階級玩意兒；右翼作家說它有左傾嫌疑。」<sup>30</sup>憂慮招致「思想有問題」、「左傾嫌疑」的質疑，應該是她下決心「焚書」的主要動機。

「焚書」之外，她同時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改寫。以《從軍日記》中的一篇〈給女同學〉爲例，這篇文章寫於 1927 年，是她在軍校受訓三週後的切身體驗與對女兵的自我期許。1991 年，這篇文章易名爲〈半世紀前的一封信〉收入《冰瑩書信》。仔細比對，前後二文作了一些更動與刪改，從中可以看出 20 年代激情昂揚的文字到了 90 年代已有了較爲溫和中立的表述方式，例如「同志」改爲「同學」；「我們的生命都交給了黨和民眾」改爲「我們的生命，都交給了國家民族」；在談到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關係時，原本引用了郭沫若的話：「沫若先生說得好：

---

<sup>30</sup> 謝冰瑩：〈焚稿記〉，《故鄉》（台北：力行書局，1958 年），頁 179-181。

『我們每一個人像些零碎的鐵片，我們應該要把許多碎鐵鑄在一個大的爐內。』」但這段話被刪了；在提到如何做個革命的實行者時，原本具體主張「脫離封建制度的家庭」，後來改為較寬泛的「剷除封建思想」；對於中國過去婦女運動失敗的原因，她指出是：「這種少數的資產階級革命，當然不能成功」，後來改為：「這種自私的婦女革命，當然不能成功」，刪去「資產階級革命」的左翼話語；最後的結語，原本寫道：「學校用勞動者的血汗換來的種種供給我們」，被改成：「學校用國家的財力來栽培我們」，以民族話語取代階級話語。由此可以看出，謝冰瑩的左翼思想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她的代表作《女兵自傳》。謝冰瑩當年顯然有計畫要寫《女兵自傳》三部曲，但只完成上卷《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年）、中卷《女兵十年》（1946年），即未再續寫，後來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將上中二卷合在一起重新出版，並易名為《女兵自傳》。1948年來台後，她「把上中兩卷從頭到尾修改了一遍，由36萬字當中，刪去了14萬字，由力行書局出版」，她自認「比過去精彩多了」，但「還有朋友責備我不該刪的，她們喜歡看原來的本子」<sup>31</sup>。對於大幅刪減《女兵自傳》，謝冰瑩寫過一篇〈我怎樣整理女兵自傳〉，提到因為刪去了遊記、遊戲文章、不夠精鍊流暢的文句、印錯的字和標點等，所以篇幅減少，但就是沒有提到關於左翼思想的問題<sup>32</sup>。

以下將採表格對照方式，陳列《女兵自傳》1936年上海良友版、1948年上海晨光版、1956年台北力行版三個不同的版本<sup>33</sup>，藉此可以清楚看出謝冰瑩三個不同階段的政治意識與立場，其中的轉折變化，說明了她由左翼到右翼的發展軌跡：

<sup>31</sup> 以上見謝冰瑩：〈怎樣寫《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我的回憶》（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174、175。

<sup>32</sup> 謝冰瑩：〈我怎樣整理女兵自傳〉，《故鄉》，頁159-162。

<sup>33</sup> 本表格是以2013年12月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研究生林孟君論文《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中的表格為基礎，但刪去其中有關婦女解放的部分，保留有關政治意識的部分，並對表格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補。謹此說明並誌謝。

謝冰瑩生命史	女兵自傳三部曲的對照		
	《一個女兵的自傳》 (上海：良友，1936)	《女兵自傳》 (上海：晨光，1948)	《女兵自傳》 (台北：力行，1956)
1926 年就讀於長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	〈鬥爭生活的開始〉：長沙各校學生為「六一」慘案遊行，向省府請願，高喊「打倒帝國主義」，這件慘案像一顆炸彈，喚醒了躲在圖書館看《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謝冰瑩。(頁 118-119)	刪除〈鬥爭生活的開始〉	刪除〈鬥爭生活的開始〉
1926 年暑假：謝冰瑩陪罹患肺病的二哥在嶽麓山養病	〈當兵去〉：二哥給謝冰瑩看「XX 社會主義 ABC，社會主義淺說，以及其他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頁 132)	改寫成「他給我看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頁 99)	再改寫成「他開始給我看關於新文藝方面的書」(頁 48)
1927 年就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女生部	〈血的五月〉：「在鮮血的五月裡，國際工人代表團來到革命中心地的武漢了，工農革命的領袖也來到武漢了！……站在廣場裡的兩萬餘人都發狂了，好像明天真的世界革命就要成功了似的，誰都忘記了黑暗，只望見光明……用革命先烈的血染成的五月呵，永遠被紀念在我們的心裡，可是 1927 年那些熱烈地紀念你的人們，又不知有多少做了烈士？」(頁 178、181)	保留〈血的五月〉 (頁 134-136)	刪除〈血的五月〉
1927 年參與北伐	〈三個老囚犯〉：北伐軍隊進駐農村，農民開群眾大會，送三個土豪	刪除〈三個老囚犯〉	刪除〈三個老囚犯〉

謝冰瑩生命史	女兵自傳三部曲的對照		
	劣紳進革命軍師部槍決。(頁 192-202)		
	〈入獄〉：和兩位北伐男同學莫林、艾斯一起被視為「思想嫌疑犯」被捕入獄，三天後獲釋(頁 317-332)	保留〈入獄〉(頁 231-241)	保留〈入獄〉篇名，但內容大幅改寫，變成與艾斯、華君三人被冤枉牽涉一樁綁票案而被抓，刪去了原來思想犯的部分。(頁 169-172)這篇〈入獄〉其實是1948年版的〈第二次入獄〉。
1928 年前往上海		〈最緊張的一夜〉：往上海的輪船上，幫助謝冰瑩的茶房是曾在北伐途中一起開過會的革命同志。「當我們的隊伍開到咸甯時，他那時還是海員工會的代表，他和我在一起開過會，所以認識我，同時告訴我許多關於我們走後咸甯縣的民眾受到壓迫的種種情形，最令我聽了難受的是那位工作很努力負責的錢遠潔女士，也做了壯烈的犧牲。」(頁 302)	刪除〈最緊張的一夜〉
就讀上海藝術大學		〈開始和窮困奮鬥〉：上海藝大的主任、教授們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頁 316)；「正當我躺在床上看一本革命理論的時候」(頁 317)	將「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改寫成「文化界有名人士」(頁 173)；將「看一本革命理論」改寫成「看書」(頁 174)。
		〈解散之後〉：謝冰瑩就讀的上海藝大積極策動民眾運動，有一名學	改為〈學校被封了〉：「他是社會科學研究社的一位中堅人物」改寫

謝冰瑩生命史	女兵自傳三部曲的對照		
		生李特，「他是社會科學研究社的一位中堅人物」；為鎮壓民眾運動，「鄭伯奇、馮乃超幾位先生」被法租界的巡捕逮捕。（頁 338-339）	成「他是平民夜校的校長」；「鄭伯奇、馮乃超幾位先生」改寫成「幾位先生」。
1930 年就讀北平女師大		〈南歸〉：謝冰瑩逃離北平到武昌，原因是「為了參加一個文化團體的工作，參加幾次戲劇的公演，為了曾主編過一個婦女月刊，這些竟都被視為犯罪的主因」（頁 378）	這些文字全數刪除。
1933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		〈多難的「三八」〉：「每個民眾的心還是那麼熱烈，那麼痛恨日本軍閥，崇拜十九路軍的全體官兵。」（頁 419-421） 〈沒有目的底旅行〉：描寫十九路軍的革命行動受到民眾歡迎。「十九路軍退回了福建之後，他們在閩西建設了一個新的社會，……在這兒負主要責任的是蔡廷楷將軍。鴻是閩西善後委員會的負責人」。鴻邀請謝冰瑩參觀，並給科長職位。（頁 422-424）	〈多難的「三八」〉被刪除  改寫為〈閩西之行〉：刪除十九路軍及閩西特區的相關文字及記錄
1933 年遊歷閩西福建龍岩		〈跛子校長〉：提到好友鴻請她來龍岩，並安排她擔任「科長」一職。文中寫道：「會裡	有關在福建擔任科長職務的內容全數刪除



謝冰瑩生命史	女兵自傳三部曲的對照		
		<p>早已發表我做科長，因為怕我不答應，……所以沒有告訴我。」「我在平權女校完全是盡義務，所以那時的生活費是『科長』給我的，除了有時替《閩西旬刊》看看稿子而外，我什麼事也沒有做。等因奉此的公文，都由一位陳科員包辦。」（頁 434）</p>	
		<p>〈土皇帝〉：龍岩古田有位農民出身的土皇帝，「他的思想是屬於社會主義的，可是他並不主張用激烈的手段來槍殺地主，沒收土地，他是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一切糾紛的」他在古田受民眾愛戴，稱他為土皇帝（頁 436）。</p> <p>〈民眾大會〉：蔡廷楷將軍由龍岩到古田，發動民眾抗日。赤足戴斗笠的婦女也接受軍事訓練。（頁 444）</p> <p>〈別矣，古田！〉：離開古田，離開龍岩，要到廈門去教書。（頁 446）</p>	<p>刪除〈土皇帝〉、〈民眾大會〉、〈別矣，古田！〉三篇</p>
		<p>〈意外之災〉：謝自白未加入任何黨派，「近二十年來中國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政治。黨派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問題愈來愈複雜。但我是</p>	<p>刪除〈意外之災〉</p>

謝冰瑩生命史	女兵自傳三部曲的對照		
		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遊歷完閩西後，謝到廈門中學教書，卻有人造謠，說她是「社會民主黨、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受閩變牽累，謝冰瑩離開廈門前往上海。（頁 461）	
		〈謠〉：謝冰瑩看到上海申報上一批通緝閩變份子名單裡有她，柳亞子建議謝冰瑩回故鄉長沙休息一段時期。但在長沙，卻又看到小報拼命寫攻擊謝冰瑩的文章。（頁 469-470）	刪除〈謠〉
1934 年第二次赴日留學		〈公開的秘密〉：謝冰瑩在東京留學，「我除了補習會話和文法外，還在青年會聽陳文瀾的小說課程，記得他那時教的是『我們的成果』是一個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裡面有幾篇寫得很好。」（頁 476）	刪除〈公開的秘密〉
1937 年籌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上抗日戰線		〈出發〉：謝冰瑩領著婦戰團唱革命歌曲，「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著義勇軍進行曲……一同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頁 520）	篇名改為〈忠孝不能兩全〉：婦戰團改唱「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著抗戰歌曲……一同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頁 268）

由上表那些被刪除和修改的文字可以看出，早期謝冰瑩的左翼色彩其實非常濃厚，她閱讀「社會科學、革命理論」的書（〈當兵去〉），讚頌「革命的中心地」武漢（〈血的五月〉），支持農民開群眾大會槍決土豪劣紳（〈三個老囚犯〉），被視為「思想嫌疑犯」入獄（〈入獄〉），肯定十九路軍在閩西建設新社會（〈多難的「三八」〉），擔任閩西特區的科長（〈沒有目的底旅行〉），被列入閩變通緝名單（〈謠〉）等等，這些「自白」正是她左翼身份最好的證明，否則她也不會在來台之後將這段歷史「除之而後快」。

《女兵自傳》中最令人側目好奇的應該是她的閩西龍岩之行，相關的文章包括〈沒有目的底旅行〉、〈跛子校長〉、〈土皇帝〉、〈民眾大會〉、〈意外之災〉、〈謠〉等，她涉入的痕跡被刻意寫得模糊，但也「呼之欲出」。特別是〈意外之災〉，給人「欲蓋彌彰」的印象，文中提到：

近二十年來中國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政治。黨派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問題愈來愈複雜。但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來到福建，原來沒有一定目的，完全是旅行性質，及到接受了廈門中學的聘約以後，才下決心暫時在這裡重度起粉筆生涯來。沒想到一些帶著有色眼鏡的人，竟造出無稽之謠來，說我是什麼社會民主黨，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其實呢？我還是我，既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更沒有當過什麼部長，只是一個廈門中學的教員而已。<sup>34</sup>

她也許沒有擔任「部長」，但她確實出任閩西善後委員會的宣傳「科長」，這在〈跛子校長〉中清楚明載，她也以此身份到平權女校對全體學生公開講話勉勵。這或許是她後來會被列入閩變分子通緝名單的原因。

當然，以上與北方左聯、閩西特區的關係後來都遭到她全盤否認。曾經堅定的左翼立場與政治意識，在來台之後，也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女兵自傳》在她有意的修改之下，凡是被政府視為禁忌、具左翼色彩的口號字眼都被她小心謹慎

<sup>34</sup> 謝冰瑩：〈意外之災〉，《女兵自傳》（上海：晨光出版社，1948年），頁461。

地刪除修改，例如「工農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解放萬歲」、「義勇軍進行曲」等。儘管無法轉變成「右翼」立場，至少她設法讓這些文字由左翼向中間偏移，盡量給人中立、不偏激的聯想。從《從軍日記》到《女兵自傳》，不同文字、版本的對照，可以看出謝冰瑩在文字修改背後難言的隱痛，以及在特殊政治氛圍下謹慎顧慮的複雜心態。

## 五、立場轉變背後的難言隱痛

我們不禁要問，謝冰瑩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一改再改？如果她有難言的隱痛，那又會是什麼？她曾經有過鮮明的左翼思想與立場，透過上述的論證，應該是無庸置疑。唯恐左翼經歷再度被人提起，她選擇了向右翼靠攏，這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還是政治意識的「起義來歸」？從現有材料分析，這兩種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我們可以從「時代」與「個人」這兩個角度來分析謝冰瑩心境轉變的原因。

首先，從時代氛圍來看，1950年代的台灣，充斥著高壓戒嚴的政治氣氛，大陸政權的喪失，使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痛定思痛」，透過高舉「反共復國」政策，對政治、思想、文化、文藝等所有「戰線」都採取嚴密控制的手段，試圖以「思想統一」來收拾人心的破碎。身為作家的謝冰瑩，不可能不會察覺，左翼社會主義思想與言論已成為政府當局的大忌。台灣當時一黨專政的政治戒嚴，制訂了官方反共文藝政策，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等官方或民間的社團組織相繼成立，整個文壇籠罩在「反共文學」的號召下，強調民族統一以對抗階級分化。1954年，中國文藝協會發起「文化清潔運動」，又稱為「除文化三害運動」，大力掃蕩「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等書刊，同年8月即有《中國新聞》、《世界評論》等十份刊物被勒令停刊，一時文壇風聲鶴唳，人心惶惶。1955年，官方推動戰鬥文藝，將《軍中文藝》改名為《革命文藝》，謝冰瑩擔任編輯委員。同年，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立，謝冰瑩擔任監事。此外，由於她與中國文藝協會發起人張道藩有私交，張道藩多次拜託謝冰瑩協助文藝事務，張道藩正是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的

主要推手。由此看來，謝冰瑩不僅瞭解當時文藝政策，而且還是重要的推動者。既然深知文藝走向，謝冰瑩不能不在立場上有所隱晦和調整。她對《女兵自傳》中左翼色彩文字的改寫，正是要避免有心人士「不當的聯想」。

爲了表現出與政府政策一致的立場，謝冰瑩於 1963 年發生的《心鎖》論戰中主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女作家郭良蕙的暢銷小說《心鎖》，於 1962 年出版，因爲內容對性愛的描寫大膽露骨，引起極大爭議。1963 年，婦女寫作協會向內政部要求查禁《心鎖》，當《心鎖》被以妨害風化罪查禁後，中國文藝協會和婦女寫作協會同時開除了郭良蕙的會籍，蘇雪林撰文指《心鎖》是「黃色小說」<sup>35</sup>，而謝冰瑩也和郭良蕙互相以公開信形式展開論戰。謝冰瑩在公開信中以人身攻擊的方式，抨擊郭良蕙「長髮披肩」、「擦口紅」是「搔首弄姿」，對小說中涉及亂倫情節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評：「唉！良蕙，爲什麼你要寫這些亂倫的故事？……你在後面還理直氣壯地提出藝術的問題，你要革命，反抗，反傳統，反封建……於是你提倡『亂倫』，你借男主角的口吻說出人類都是和禽獸一樣需要性生活，整個的心鎖，描寫性行爲，所以你發了財！這本書的銷路愈好，你製造的罪惡愈大！」<sup>36</sup>在信的後段她語帶溫情的表示：「良蕙，我和雪林是爲了愛護你，愛護讀者，愛護神聖的文壇，才不惜拿出我們的赤心來坦白地勸告你，望你立刻懸岩勒馬，回頭是岸，從此洗心革面，改變作風，運用你的聰明，多寫幾部有益社會人心的作品出來，好洗滌心鎖和青青草的污點。」<sup>37</sup>這些表面上「苦口婆心」的勸諷，其實句句是「別有用心」的指責。這封公開信的保守語言和衛道姿態，和 1920 年代勇於衝撞體制、極力鼓吹婦女解放、高喊「革命，反抗，反傳統，反封建」的謝冰瑩完全南轅北轍。她的尖銳攻擊與評論，明顯是爲官方發聲，也是對自己過去左翼激進立場的全盤否定。她站在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立場，對同爲女作

<sup>35</sup> 蘇雪林：〈評兩本黃色小說《江山美人》與《心鎖》〉，《文苑》第 2 卷第 4 期（1963 年 3 月）。

<sup>36</sup> 謝冰瑩：〈給郭良蕙女士的一封信〉，《自由青年》第 29 卷第 9 期（1963 年 5 月），頁 17。

<sup>37</sup> 同上註。《青青草》是郭良蕙繼《心鎖》之後在《徵信新聞報》副刊上聯載的長篇小說，後由台北漢麟出版社於 1963 年出版，1986 年再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出版時改名為《青草青青》。

家的郭良蕙公開批判，對帶有突破禁忌的革命精神予以無情打壓。這也許是她發自內心對寫作者職責的高度期許，但也可能是「政治正確」風向的有意呼應。

其次，從個人因素來看，謝冰瑩與左翼劃清界限的舉止和她的丈夫賈伊箴有關。謝冰瑩的好友魏中天說，謝冰瑩「有二件事，始終不敢告訴她丈夫，她丈夫很反動，第一件是她過去參加左翼聯盟的事，第二件是參加福州十九路軍反對蔣介石政權的事。……有一次見面，她私下要求我在她丈夫面前，說她未參加這二件事。」<sup>38</sup>足見謝冰瑩對這二件事的顧忌很深。謝冰瑩與賈伊箴於1940年結婚，育有二男一女，感情深厚穩定，但賈氏「不但堅決反共，而且對大陸上的一切都抱有敵意。他反對謝冰瑩跟大陸親友通信，一看到大陸寄來的信函，便立即撕個粉碎，致使謝冰瑩不得不在他面前有所迴避」，因此有相當長的時間，她與大陸親友通信都是用女兒或朋友的地址，直到1988年7月賈氏病逝後，她才通知親友「此後你可直接寄我了」<sup>39</sup>。爲了不引起丈夫的疑慮，保持家庭的和諧，她只能保密般地隱瞞自己過去參與左翼運動的歷史。這是謝冰瑩政治立場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無論如何，歷史總是在發生的時刻就已經存在，不會隨個人意志轉移，謝冰瑩的「用心」現在看來確實是「良苦」。

## 六、結語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青年謝冰瑩以一介女子對抗封建禮教，力爭婚姻自主，又以一腔熱血投身革命的行列，曾經有過的左翼思想，使她與北方左聯、福建事變有密切的關連，並且與中共地下黨一度關係匪淺。但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後，她的政治立場與文學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她不顧左翼作家對林語堂的攻訐，以投稿力挺；在重慶受聘爲教育部的特約編輯，撰寫抗日宣傳小說；響應國民政府號召，再度從軍加入對日抗戰的前線工作。最終，她選擇於1948年來台，

---

<sup>38</sup> 見欽鴻：〈關於謝冰瑩〉（二篇），《新文學史料》第4期（2002年），頁137。

<sup>39</sup> 見1988年10月6日謝冰瑩致魏中天函，引自欽鴻：〈關於謝冰瑩〉（二篇），《新文學史料》第4期（2002年），頁138。



並對自己過去的左傾行為開始進行低調卻持續的「清理」。

整體來看，從北伐作戰到《心鎖》論戰，她的「義無反顧」精神是一致的；從階級立場到民族立場，她的「與時俱進」心態也是一致的。左右謝冰瑩，都是真實的謝冰瑩。她絕對不是單一的「個案」，而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典型「現象」<sup>40</sup>。從謝冰瑩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氛圍與政治環境對作家所產生的影響是如此潛在卻巨大。

## 徵引書目

### 一、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 2010《左聯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左聯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 1990《「左聯」紀念集》，上海：百家出版社。

艾以、曹度主編 1999《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余光中編 1988《秋之頌》，台北：九歌出版社。

姚辛 2006《左聯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欽鴻編 2000《永恆的友誼——謝冰瑩致魏中天書信集》，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

閻純德、李瑞騰編選 2002《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謝冰瑩 1933《從軍日記》，上海：光明書局。

謝冰瑩 1936《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

謝冰瑩 1941《梅子姑娘》，西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謝冰瑩 1948《女兵自傳》，上海：晨光出版社。

謝冰瑩 1956《女兵自傳》，台北：力行書局。

謝冰瑩 1980《女兵自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謝冰瑩 1958《故鄉》，台北：力行書局。

---

<sup>40</sup> 例如和謝冰瑩同時加入左聯北方部的台靜農，他是魯迅的弟子，是魯迅領導的「未名社」的一員，與魯迅關係密切，又與中國共產黨創建者陳獨秀有深厚的友誼，1946年來台之後對這些過往低調不談，但其內心悲苦與無法言說的感慨在其《龍坡雜文》及古典詩作中可以窺見一二。

謝冰瑩 2004 《我的回憶》，台北：三民書局。

謝冰瑩 1981 《抗戰日記》，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二、期刊論文

李夫澤〈謝冰瑩與「左聯」〉，《婁底師專學報》第3期，1999年。

欽 鴻〈關於謝冰瑩〉（二篇），《新文學史料》第4期，2002年。

蘇雪林〈評兩本黃色小說《江山美人》與《心鎖》〉，《文苑》第2卷第4期，1963年3月。

謝冰瑩〈給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開信〉，《自由青年》第29卷第9期，1963年5月。

## 三、學位論文

林孟君《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 On Xie Bingying's Leftist Beliefs and Later Transformation

*Chang, Tang-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Xie Bingying, a female soldier during Northern Expedition, was famous for her *A Woman Soldier's Own Story* and *A Diary of a Soldier* (among other works) and named "The Eternal Woman Soldier" in the literary world. Although Xie once deni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ftists, much research has shown he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eftist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1930s. However, after relocating to Taiwan, Xie started concealing and even correcting her earlier radical leftist thoughts. The strongest evidence for proving such a correction was that she destroyed her quasi-leftist novel—*The Uncertain Path in the Front*—and considerably revised *A Woman Soldier's Own Story*. Every word,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taboo or a leftist slogan by the government, was carefully deleted or corrected by Xie. Her stance changed from left-wing to right-wing, and from radical to conservative—is this change a choice or a result of death threats? How strong was Xi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ftist?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Woman Soldier's Own Stor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analyze Xie's unspeakable personal history.

**Keywords:** Xie Bingying, leftist thoughts, the Leftists, *A Diary of a Soldier*, *A Woman Soldier's Own Story*

